

清代“走西口”移民背景下蒙汉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研究

◎白文进

(吉首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)

【摘要】“走西口”不仅是一部顽强拼搏的移民史，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，同时也是蒙汉两族人民建立友情，同创文明的发展史。“走西口”中的汉族移民，为了生存而留下来的种种足迹，已然成为促进蒙汉民族融合，口外地区社会变迁的钥匙。蒙汉人民共同培育的“坚持不懈，发奋图强，勇敢勤劳，开放包容”的“走西口”精神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，已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独具风采的地域文化。

【关键词】“走西口”；移民；交往交流交融

【中图分类号】C951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2096-8264(2024)36-0065-03

【DOI】10.20024/j.cnki.cn42-1911/l.2024.36.019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清代改土归流后西水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（1735—1911）”（23BMZ016）；吉首大学科学研究项目“清代‘走西口’移民背景下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”（Jdy23112）。

万里长城，起春秋，历秦汉，及辽金，至元明，西从嘉峪雄关而来，东到山海要隘，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蟠伏在中华大地上，分割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，见证了金戈铁马、烽火狼烟的历史风云，承载着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记忆。烽烟远去，雄关犹在，关隘成为出入长城的要道。

从明朝中后期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大批晋、陕百姓离开故土，离开亲人，前往口外，开辟了通往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，促进了蒙汉民族交融。山西人作为“走西口”的主力军，多从北部和中部出发。

一、“走西口”概况

“走西口”是指山西、陕西等地的人们穿越长城内到口外谋生而开垦、经商的移民活动。关于“口”的说法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，狭义中的“口”一般指位于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，广义上的“口”指位于长城内外各个关口，例如陕西的府谷口、河北的独石口等，山西、陕西等地的人们通过长城的各个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。很多人背井离乡，离开家人，踏上遥远而未知的路程，踏上一个陌生的地界去寻找那未知的生存希望。杀虎口作为其中之一关口，当时还有匪患，有民谣传唱：“杀虎口、杀虎口，没有钱财难过口，不是丢钱财，就是刀砍头，过了虎口心还抖。”到了口外以后，面临的还有戈壁沙漠、寒冷的天气等重重困难。

“走西口”大致有以下几条路线：

（一）神府线。主要以陕西榆林地区为起点，向北越过长城，途经大柳塔、纳林以及毛乌素沙地，最终进入鄂尔多斯地区。

（二）河保线。主要以山西省河曲县和保德县为出发点，在河曲县黄河边的西口古渡上船，横渡黄河以后到达内蒙古地区，过十里长滩，然后继续北上到达鄂尔多斯地

区，可以在此进行定居，也可以继续北上，渡过黄河，最后到达河套、包头等地区。

（三）偏右线。主要以山西省偏关县和右玉县以及附近的县为出发点，先北上过杀虎口，到清水河或者归化（呼和浩特），可在此定居生活，或者继续出发到土默特地区和包头地区。

（四）雁门关线。主要以山西省忻州地区各县为起点，过雁门关出长城，这条线路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通关通道，这条路线可以通行商队，运输货物。

（五）大同线。主要以大同地区各县为起点，出大同北上，经过丰镇，到达察哈尔等地区，也可继续向西出发到达归化城。

（六）张家口线。主要以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各县为起点，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关，经过草原，最终到达察哈尔、张北县等地区。

以上就是“走西口”的大致路线，具体可能会有更多的路线，此处不一一阐述。

二、“走西口”原因探析

作为三次人口大迁移之一的“走西口”对当时的人们来说，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，总之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已“走西口”，这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中国人自古便有浓厚的乡土情结，是怎样的驱动力能让数百万先祖背井离乡，踏上那满是荆棘，生死未卜的道路，只为奔一个福祸难测的前程呢？古人云：“不通则痛，痛则不通，万物疏通，则民心可定。”

（一）自然环境恶劣，干旱多变

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侧，华北大平原的西部，全省大约80%以上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，平原面积不足20%，适合

耕种的土地很少,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。光绪《天镇县志》记载:“天寒地瘠,地土沙碛砾泊。”光绪《阳高县志》记载:“独居塞北,砂碛砾泊,低土难耕。”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,虽辛苦劳作一年,但最终收成却很少,有时遇上天灾等不利因素,土地产量更低。康熙《灵丘县志》记载:“地土砂碛,坂田砾确。岁丰,亩不满二斗,稍歉则籽粒半失。”由于山西交通不便,外地粮食进入不方便,所以平常粮价就偏高,清代山西的百姓生活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中,一旦遇上灾荒年,就发展为极大的灾难,而山西素有“十年九旱”之称。雍正《朔平府志》记载:“夏旱,秋潦,早霜,次年大饥。”清末山西出现了“二百年未见”的“丁戊奇荒”。“光绪二年旱,三年大旱,二麦不登,遂大饥。”^①山西民人为了摆脱饥荒,只能另寻他路。

(二)人地矛盾突出,人口激增

清初,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,社会安定,清朝发布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的措施,如康熙帝颁布了“滋生人丁,永不加赋”的诏令后,口内人口数量快速增长,人地矛盾日益激化。“雍正二年,晋、陕等省的人口已均达600万以上。”^②人口数量不断增加,但是没有足够的耕地去供应增加的人口,人均耕地不断减少,随着豪强地主持续进行土地兼并,农户们也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,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,食不果腹。在这种情况下,山西人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口外广袤的土地上。离开故土,走向口外谋生、经商的人也在不断增加。《调查河套报告书》记载:“自清康熙末年,山、陕北部贫民,由土默特而西,私向蒙人租种土地。”

(三)清廷“借地养民”,招民垦种

“走西口”移民能否取得成功,主要在于清政府的政策趋向。清初,顺治皇帝曾允许少量山西、陕西百姓去口外垦荒,但必须春去秋还,不能在口外定居,也不能携带家眷,因此当时这批百姓被称为“雁行者”。“走西口”第一批移民浪潮开始于康熙朝,当时清廷放宽封禁,开放了部分蒙地,由此山、陕百姓开始大规模迁徙到口外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,伊克昭盟盟长贝勒松拉普奏请康熙皇帝,表示愿与汉人合伙种地,这一请求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同意,此即汉民开始大批进入蒙地开垦之路。“走西口”第二批移民浪潮开始于光绪朝,当时清廷为了巩固统治,推行新政,遂开放蒙地“移民实边”。于是在那个时期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急剧增长,开垦的土地也逐渐增加,贻谷在奏折中,曾这样描述这次大浪潮:“自开办垦务后,浚渠开地,谋生之路日广,该客民等或携亲属,或约多朋,襁负而来。”

三、“走西口”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

终清一代,大量的山西、陕西人度过长城关口,走向口外,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,开垦出大量的良田,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,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不断发展的晋商加强了草原与内地的沟通,促进了口外地区商业的快速兴盛和中大型城市的形成。随着“走西

口”浪潮中大批内地人来到口外,促使草原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密切联系,蒙汉民族融合不断加深。

(一)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

当时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经济单一,以游牧经济为主,主要是畜牧业生产,对自然资源比较依赖,急需农业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,而当时晋北和陕北地区由于天灾不断,人地矛盾突出等,大批的百姓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出关去“走西口”,他们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成熟的农耕技术,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随着“走西口”的兴盛发展,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人逐渐增多,并由“雁行”慢慢发展为定居,并逐渐发展成村落,土默特、包头、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农业开垦面积进一步扩大。经过蒙汉民族的长期共同实践,逐渐探索出适合当地环境的耕作技术,种植一些耐干旱、抗盐碱、生长期短的农作物,例如苜蓿、小米等。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覆绥镇总兵米国正奏:“榆林、神木等处边口,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,岁得粮十万石。边民获粮,蒙古得租,彼此两便,事属可行。”^③在蒙汉百姓一起发展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的同时,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加深。

(二)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

最初,蒙古地区传统的手工业以牧民家庭为主,基本是自给自足。蒙古族传统的手工业种类比较单一,只有制毡、鞣皮、制乳等。随着“走西口”中大批内地百姓的进入,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手工生产技术,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手工业开始逐步发展,并走向专门化生产。农业会促进相关手工业的发展,由于农作物的大量种植,需要改进农具,而制造锄头、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必须仰仗手工业,所以手工作坊也慢慢增多,制作工艺不断进步,以满足农户的多样化需求。

随着定居的内地百姓越来越多,逐渐形成了一些村落,有的村落命名和这些手工业者有关联,例如乾隆朝时沙尔沁有村名叫碱窑子村,因有人在这里制碱烧窑。把什窑子湾,因建立瓦窑,以卖瓦盆为生遂名。石沟村,因内地百姓在沟内制造磨刀石遂名。内地来的工匠逐渐从蒙古工匠那里学会了一些蒙古族的手工艺技术,例如制皮、擀毡、乳品加工等技术,同时他们把内地的铸铁、酿造、制砖瓦等技术传授给蒙古人,制作出牧民所需的皮衣、靴帽、木盆等生活用品。手工业的兴起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,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蒙汉民族交流,蒙汉民族交融不断加深。

(三)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商业的发展

“走西口”的大浪潮也推动了内地和口外物质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,促进了商业的交流和城市的繁荣。清初,蒙古地区的商业不发达,都是以物换物进行贸易,贸易形式主要为“通贡”和“官市”。

18世纪中叶以后,由于“封禁令”的松动,越来越多的

山西百姓来口外经商，被称为“旅蒙商”，他们最初是以行商的形式出现，先在内地或者归化等地备好牧民所需的生活用品，例如砖茶、绸缎、米、盐和铁器等，主要依靠肩挑、马拉、骆驼驮载货物到后草地后换取牧民的牛、羊等物品。内地商人通过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去赚取利润，后逐渐成立了一些商号，比较著名的有“大盛魁”“天义德”“元盛德”等大商号。“大盛魁”是由山西商人王相卿、史大学和张杰三人创立，最初跟随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军队，作为随军的杂役，肩挑货担做随军贸易，逐渐学会一些蒙语，在右卫杀虎口创立“吉盛堂”，康熙末年，“吉盛堂”更名为“大盛魁”，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，后迁到归化城。“大盛魁”根据游牧民族的贸易形式，采取了以物易物，信用交易的方式，逐渐垄断漠北商业，运输路线遍布蒙古地区。同时随着晋商的发展，一些城市也逐渐繁荣兴盛起来，民间有民谚说：“先有复盛公，后有包头城”。这些商号的建立以及贸易的往来，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商业的发展。商业贸易的繁荣，推动了蒙汉民族的交往与交流，促进了蒙汉民族的交融。

（四）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文化的发展

“走西口”有近三百年连续不断的历史，在这悠久的岁月中，一代又一代的内地汉族人民不畏艰险，长途跋涉来到蒙古地区，他们有的放牧，有的垦荒，有的经商，有的从事手工制造等以求谋生。在这些过程中，蒙汉人民聚居杂处，互相交往交流，这不仅有利于草原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的融合，而且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成。

1. 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汉民族生活习俗渐趋一致

在“走西口”的几百年时间里，蒙汉人民长期共同生活、生产，从而促进了生活习俗的融合。乾隆七年，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称：“数十年以来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，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者四五十万。”乾隆十九年，山西布政使多伦奏：“蒙古内地民人错杂居住，不下数十万户。”

在居住方面，大批山西人以“走西口”的方式，将农耕文明的晋文化带到蒙古地区。《归绥县志》记载：“邑民其先多晋产，亦多晋俗。”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，许多蒙古人也开始用泥土进行砌筑、房顶架、灶火通炕。有一些蒙古居民放弃毡包，开始建造平房居住。在饮食方面，蒙古人传统的饮食仅有“肉食”和“白食”，后随着晋文化的传入，他们开始吃谷子和小麦等食物，有的地方开始吃山西风味的醋和酸菜，而汉人吃大块牛羊肉，煮茶时加盐等则是受草原文化的影响。

2. 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汉民族语言文字趋同

蒙汉民族长期聚居在一起，除了生活方式外，语言也受到了晋语系统的影响，例如在包头方言中常见“圪”一字，如：圪蹴（蹲）、圪堆（堆）、圪塌（啰唆）、圪尖尖（尖），同时有些汉语词汇也引入了蒙语。“走西口”来的移民和蒙

古族杂居，逐渐学会了蒙古语，而蒙古族同胞也逐渐通晓汉语，识汉字。《绥远通志稿》记载：“省境与晋地相接，住民亦多晋籍，所列方言间有与晋语从同者。要以省民承用已久，亦或言是而意非，字同而音异。”《土默特旗志》也载：“内地民人渐集，汉文风气一开，蒙人遂多肄汉书。”

3. 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文化艺术的繁荣

蒙汉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和交流，内地汉族人民给蒙古草原带来了具有汉族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。随着笛子、四胡、三弦等乐器的传入，蒙古族音乐在以前“长调”基础上产生了一种“短调”歌曲，如《金杯》等。在“短调”的基础上，逐渐诞生了新的歌曲“漫瀚调”，它是蒙汉两族音乐互相融合吸收，通过各自语言唱出来的，所以又称“蒙汉调”。同时“二人台”是在“走西口”这一历史长河中孕育而成的，它是蒙汉民族民间文化的天然融合，是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的一颗令人喜闻乐见的硕果。“二人台”把民歌、歌舞、说唱、戏曲等诸多体裁融成一个整体，是蒙汉儿女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。

四、结语

“走西口”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往和交流，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，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以及文化的繁荣发展，对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，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，增进了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团结，促进了蒙汉民族交融，“走西口”这一移民浪潮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历史见证。

注释：

①《（光绪）安邑县志》清光绪六年刻本，《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》第11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529页。

②赵文林、谢淑君：《中国人口史》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596页。

③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5，乾隆元年三月丁巳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，第414页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（清）沈潜.归化城厅志[Z].内蒙古图书馆藏，光绪二十三年修抄本。

[2]周少卿.河曲县志[M].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9.

[3]（清）圣祖仁皇帝实录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（影印本），1986.

[4]韩巍.清代“走西口”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[D].内蒙古师范大学，2009.

[5]刘春玲.论清代走西口对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[J].阴山学刊，2006，（03）.

作者简介：

白文进，男，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中国古代史。